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马强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12
ISBN 7-220-06845-X

I. 汉... II. 马... III. ①汉水—上游河段—历史地理—研究—文集②蜀道—历史地理—研究—文集
IV. 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2859 号

HANSHUI SHANGYOU YU SHUDAO LISHI DILI YANJIU

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

马 强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谢 雪
邹小工
古 蓉
袁晓红 何秀兰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cn>
<http://www.scrmcb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印 刷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35 千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6845-X/K·1004

定 价

25.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028-86663361)

目 录

序	蓝 勇 (1)
自 序	(4)

上 编

汉水上游生态资源的历史变迁及其成因	(3)
论早期汉水上游与渭水流域的关系及意义	(21)
汉水流域与秦汉王朝的兴盛	(32)
汉水上游军事历史地理研究	(48)
汉水流域与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战略	(66)
唐宋兴元府城初探	(78)
唐宋诗所反映的汉中历史地理	(86)
唐代诗人汉中史地诗考略	(99)
先秦至隋唐间汉水上游地区的农业开发	(121)
宋元至明清汉水上游农业地理的变迁	(138)
历史时期汉中盆地的生态环境及变迁	(152)
论历史时期汉水流域的文化政治地位	(172)

从汉水流域的历史经济盛衰看其在西部开发 中的资源优势	(180)
刘邦入驻汉中三题	(190)
汉中郡移治南郑时间考	(196)

下 编

蜀道文化述论	(201)
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217)
蜀道历史军事地理论略	(233)
蜀汉人口初探	(246)
唐宋诗所反映的蜀道历史地理	(254)
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	(267)
诸葛亮崇拜与古代蜀汉地区的民间信仰	(279)
《郾阁颂》历史流传初探	(291)
历史时期蜀道地带森林的分布与变迁	(297)
蜀道旅游资源的开发	(310)
后 记	(322)

序

今天中国陆上面积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历史时期的中国各民族有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陆上活动空间。面对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六七千年的文明史，可能任何学者都难以将研究深入进去，所以这些年区域历史研究方兴未艾，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热点。

以往的区域研究，主要是按行政区划为空间来进行研究，如研究四川史、陕西史、广东史，或完全以文化区来进行研究，巴蜀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但是区域历史发展往往是十分复杂的，历史上的行政区在不断变化，而各文化区也在不断浸染渗透之中，可能也会受行政区域变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异，许多特殊的历史事实可能形成相对有内在联系的区域，这往往是我们以前没有注意的。

近些年来，在历史地理学界，许多同行都知道马强先生长期以汉水和蜀道巴山地区为研究的空间，潜心耕耘着。我认识马强最初是于文中，大约是在1993年的汉中国际蜀道及石门石刻研讨会上才开始有一面之交，后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太多，但由于我们研究的空间和内容十分相近，不时拜读马强先生写的关于汉水和蜀道历史方面的论文，读起来总感到十分亲切。

马强先生的论著在空间上特色鲜明，主要以汉水上游、巴山地区和蜀道金牛道沿线为主要研究空间。从现在来看，这种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的区域研究并不太多，也正是因为这样，这种研究十分必要。其实在我看来，马强先生本身是发现了这其中内在的区域文化背景的。汉中与川北地区在历史上很早时就是以蜀汉相称，宋代设立的利州路横跨南北，表明虽然有大巴山的阻隔，但文化却一体一脉相传。只是到元代建立陕西行省，以大巴山为陕西与四川省界，川北和汉中地区才分隔山南山北。但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有这样长的一级政区的文化浸染，历史文化的内在共性十分多，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也正是因为这样，以往的学者关注得不够，研究得并不充分，而马强先生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

马强先生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汉水上游、巴山地区和蜀道的经济开发、军事地位和生态环境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如经济方面的《北宋以前汉中地区的农业开发》《论唐代以后汉中盆地农业地理的变迁》《蜀汉人口初探》《唐宋兴元城初探》《从汉水流域的历史经济盛衰看其在西部开发的资源优势》等，在军事方面如《汉水流域与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战略》《汉中地区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唐宋诗所反映历史地理》《蜀道历史军事地理论略》等，生态环境方面如《汉中地区生态资源的历史变迁及其成因》《历史时期汉中盆地的生态环境及变迁》《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历史时期蜀道地带森林的分布与变迁》等，都是在这些方面有许多新的创见的论著，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对现实有一定的启示。

这些年来马强先生在研究方式上多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去

考察区域历史，而且与区域经济的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许多论著都体现了马强先生关怀现实的学术理念，这是与历史地理学关怀现实的特色相吻合的。在这些方面，如《论蜀道地带旅游资源的开发》《从汉水流域的历史经济盛衰看其在西部开发的资源优势》等都是做得很好的。

学术界这些年学术风气并不是太好，那种长期坚持集中在一个领域厚积而薄发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太多。马强先生在文献资料较为缺乏、地理位置上较为闭塞的汉中，长期以汉水巴山蜀道地区社会经济环境为研究内容，十多年乐此不疲，不断探索，成果显著，显现了马强先生严谨治学的作风，值得我们去学习。

《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的出版，无疑是我国区域历史研究中的一件好事，不仅对区域历史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利于我们的西部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一位区域历史研究的同行，受嘱为他的大作写序，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我国的区域历史研究空间还十分大，国内外的有些区域历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马强先生已经有如此好的研究基础，相信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区域历史地理成果面世。

蓝勇 2003 年 12 月 14 日于北碚

自序

2003年夏，我大学毕业工作多年之后又几经拼搏，考取了四川大学攻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即将负笈西蜀再度求学之际，学术界朋友建议我将近十年来研究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文章整理汇集，争取出版成书，算是对十年间汉上艰辛耕耘区域历史地理的一个总结。十年来忙于耕耘很少幻想有多大收获，况且我的研究区域是向不为人注意的跨越巴山南北间的“小区域”，发表的篇什既无标新立异的前沿理论，又非纵横驰骋的鸿篇大论，只是一些简朴无华的对汉水上游（确切地说以汉中盆地为主）与川陕蜀道交通线地带历史地理的复原性论证，当初之所以“研究”，也只是出于对这一区域历史地理的感性偏爱而已。况且以时下的出版代价和我的收入水平，出版一本书，哪怕部头再小，恐怕也要花去我整整三年养家糊口的全部收入，这在以前是不敢想像的。然而，汉水上游与蜀道的研究毕竟已暂告一段落，出第一部书有如一个妇女期盼生头胎孩子的诱惑又驱使我利用暑假从书柜里抱出一大摞期刊，寻找一篇篇浸透我青春与汗水的相关论文。没想到按专题复印集中在一起，竟厚厚的有三十余篇之多，大约有三十万字。从字数和部头来看，倒真可以汇集一部“书”了。从事

史学学习、教学与研究二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考虑出书。摩挲“书”稿，站在窗前，望远方巴山云飘雾绕，汉水逶迤东去，汉川平原的草树烟村、田畴原野历历在目，禁不住思绪如潮，感慨万千……

从事学术研究，我因天赋愚钝，起点甚低，并且走过了一段弯路。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那个困难而饥饿的春天，童年、少年曾先后在汉中城固、沔县乡村生活过十五年之久。故乡汉中那众多的名胜古迹、悠久动人的历史传说以及美丽如画的田园风光给孩提时代寂寞孤单的我以极大的慰藉。特别是汉中通往南北远方山岭的山间栈道遗迹，常常给我带来神秘的遐想。高中毕业后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来到古城西安，成为历史系的一名大学生。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陕西师大历史系在全国高校声名显赫，系主任乃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其他如孙达人、斯维至、黄永年、赵文润、杨德泉等老师也皆著述丰富，在海内外史学界也颇有影响，可谓名师如云，为一时之盛。但大学前两年，我的业余兴趣全在历史文学创作方面，梦想成为一名青年作家，于是小说、诗歌、散文什么都写，甚至用去了整整半年时间，写过一个大型历史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可毕竟缺少生活积累与创作天赋，除少数发表以外，大多以退稿告终。但正是为写历史剧本搜集史料逐渐引起了对史学的兴趣。加之课堂上每当古代史老师讲课中涉及到汉中这一地名，班上同学向我投来友好羡慕的目光时，我心中总会涌上一种无名的自豪和对地方史研究的向往。大三时终于放下折腾了两年的文学创作，重拾专业，急起直追。曾挤入联合教室，聆听到师大讲学的漆侠、胡如雷、唐长孺等大师的学术讲座；也曾怯生生地登门求教史念海先生与孙

达人先生，幸运地得到过他们的指点。更多地是在唐史专家赵文润老师、宋史专家杨德泉老师的具体指导下重点学习唐宋史。专业学习的兴趣一旦被激发起来就有了不可遏止的学习冲动。于是我夜以继日地钻图书馆废寝忘食地研读史书，并不断把文史小文章投寄给各期刊，终于开始在《历史知识》《书林》和《读书》等杂志上发表习作。记得第一次发表我文章的是四川省社科院办的《历史知识》，是主编王纲老师利用来陕西师大参加全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的机会亲自到学生宿舍找到我告诉这一消息的。不久文章刊出。当收到样刊时，我竟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特地到小寨一饭馆买了一碗肉丝面独自美美地庆贺了一番。二十年转眼过去了，至今我仍常常想起这一难忘的往事，常常怀念慈祥而清瘦的王纲老师。本科毕业论文为《论北宋定都汴京》，冒昧投寄给《中国史研究》，几年后竟出乎意料地得以发表，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更坚定了我从事史学研究的信心，至今仍无怨无悔。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汉中，不久到汉中师范学院（现陕西理工学院）工作。汉中历史悠久却文化落后，最困难的是文献史料奇缺，当时几乎连二十四史这样的基本文献都难以寻找。好在我从陕西师大毕业时买了《史记》《三国志》等书带回汉中，加上不断写信寄钱请求在北京、西安、成都的同学朋友代购史料书，自己也利用一切外出出差、开学术会和实地考察的机会省吃俭用购买图书。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一些基本史料。每当夜深人静，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我则开始细阅苦读、摘录史料做卡片，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三国和唐宋人物与区域经济的文章。1993年我赴浙江大学历史系，师从徐规教授做访问学者，利用浙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短短半年间，积

累了十多万字的史料，其中主要是有关唐宋川陕交通地理的史料。恰好不久汉中召开国际蜀道与石门石刻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唐宋蜀道诗的历史地理与文化史价值》（后来析成两篇分别发表于《文博》与《成都大学学报》），在会上引起较好的反响和评价，受到石兴邦、郭荣璋、蓝勇、王蓬等先生的鼓励，开始对川陕栈道交通产生浓厚的兴趣。随后学院号召积极申报省教委中青年科研资助项目，我申报了“汉中盆地历史地理研究”，很快获准立项。有了初步的研究经费，开始系统地研究具有悠久历史的汉中盆地，所撰写的论文大都顺利发表。几年后，陕西省教委又批准了我另一个科研项目“汉水流域历史地理资源与西部开发研究”，并且给予较大的资金支持力度。于是从1994年到2003年近十年时间，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这两个科研项目的研究。汉中盆地、川陕交通、汉水流域几乎成为我这十年间学术生活的敏感词和关键词，这里必须一提的是四川的《成都大学学报》和南京的《中国农史》以及《汉中师范学院学报》不唯名人至上，对我这个青年作者的拙作几乎是每投必发，我有关汉水上游和蜀道研究的论文大都发表在这三个刊物。借此机会，深表感谢！

汉水流域近年来逐渐成为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热点，武汉大学鲁西奇先生、张建民先生对该流域经济史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鲁西奇先生对汉江中下游历史地理的研究近年来处于前沿水平，其《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一书，是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蓝勇教授曾有书评给予很高评价（见《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可能受地域与地方资料限制，鲁、张二先生的论著重点均在汉水中下游地区，涉及汉水上游秦巴的内容明显

较少，这或许为后学者留下了可供开拓的空间。至于将巴山南北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来研究，学术界更是少有人问津，现在能看到的较早关于蜀道研究的书是1986年西北大学出版的李之勤、胡戟等先生编著的《蜀道古话》，属于历史考察游记，介于通俗性与学术性之间。虽篇幅略小，却十分清楚地写出了蜀道变迁的历史脉络，是现代蜀道研究的开拓之作，功不可没。此外蓝勇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对巴山米仓道、金牛道的考察与研究、李之勤先生对秦岭诸古道的考证、郭荣璋先生对褒斜道交通及石门石刻的研究也有多方面突破。不过人们关注更多的仍然只是纯粹交通史意义上的栈道兴废通塞研究，笔者最初的研究也同样是这样的套路，后来才扩展到蜀道生态环境、军事地理、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陕南川北山川地理地貌相近、文化风俗也大致相同，汉设益州、魏晋南北朝置梁州、唐设山南西道、宋置利州路，陕南川北大都在同一政区，只是到元朝时为分割、控制四川，元朝中央才将巴山以北划归陕西行省、以南归四川，从此蜀汉地区分割巴山南北，分属川、陕二省。这一分割影响甚大，一方面造成打破了行政区划山川形便的规范，导致了国人对这一地区地理概念上的混乱，以至于直到今天不少空间距离较远的外省人弄不清汉中究竟是属于四川还是湖北，很少有人知道汉中其实属于陕西。另一方面，反映在历史地理学界，汉水上游也差不多成了西北、西南两大区域两不管的一个“盲区”。研究四川或西南历史地理者认为汉中属于陕西，为西北属地，往往略而不论；研究西北历史地理者，重点总是在塞外沙漠、黄土高原（包括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对秦岭以南的汉水上游也常常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一区域成了一个长期受南北冷落的“灰姑娘”。这一点甚至在一些

著名历史地理学者的论著中也有明显反映。

笔者认为，研究区域历史地理，与其说以行政区为单元，倒不如以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区为研究范围更妥当些，因为地理环境的变迁往往并不见得与政治区域的变更有必然的函数关系。汉水上游和蜀道地带自古被称为蜀汉地区，恰好地处我国大西北和大南西交汇分界的过渡地带。从文化风俗区来看，基本上属于巴蜀文化区，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根本就是巴蜀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它所表现的秦陇、巴蜀、荆楚三大文化区的过渡、交汇性特征较为明显罢了。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该区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地理资源多次成为智者必顾、兵家必争之地，并且几度成为中国历史的政治、军事焦点，曾长期辉煌、显赫，只是在近代随整个西部地区一起而衰落了。陕南川北历史上几度辉煌，皆发生在中原动荡、分裂战乱之时，如楚汉、三国、南宋及抗日战争时期，汉水上游战略地位总是急剧上升；而两汉、隋唐、明清这些大一统王朝时期，这一地区反而大部分时间沉闷寂寞、宁静而落后。因此有学者总结出这一区域具有“战则盛，和则衰”的历史特点和规律。不幸的是这一规律在远离战争的当代对区域开发、经济振兴却是十分不利的。如何避开这一历史悖论？无论是政府官员、专业学者抑或是企业家们都是必须要面对和深刻思考的。笔者生性愚钝，也难以真正解开上述悖论，只以这本小书为献芹之作，奉献给所有关心这一区域的历史和现实的人们作参考。

由于攻读博士学位，我不得不暂时中断了汉水上游与蜀道的研究，计划中的《汉水上游文化地理》《秦巴山区历史人口地理的变迁》《蜀道在中国南北文化迁移中的作用》等文章只

好暂付阙如，俟来日再补写了。黄仲则诗云：“收拾铅华归少作，摈弃丝竹入中年。”大学刚毕业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所写文章常常是大题目，而今人到中年，也许是知道自己学力不逮，所选题目却愈来愈谨慎、具体了，对那些大而空疏的文章往往敬而远之。

本书由笔者主持的陕西省教育厅高校中青年教师专项科研项目“汉中盆地历史地理研究”（1996年）与“汉水流域历史地理资源与西部开发研究”两个课题的系列论文组合而成。所选择课题本来就属于小区域，文字也大多平实无华，少有宏论，就是已发表的拙作，也总是有遗憾之处。书中所收论文基本上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只是对注释方式与部分题目略作调整、改动。加之受学力、时间、地域等主客观条件所限，本书错谬在所难免，真诚希望学界师友批评指正。

作者

2004年2月23日

汉水上游生态资源的 历史变迁及其成因

汉中地区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汉水上游秦岭、巴山之间，四周群山拱卫、河网纵横，中为汉江冲积河谷平川，主要地貌以盆地为中心，南北依次为丘陵、高山，间以若干山间平坝，地理位置处于我国西部南北地理分界线南侧。历史时期汉中盆地曾长期森林密布、野生动物众多，经过数千年自然尤其是人类活动的作用，汉中盆地的生态地理环境已发生重大变迁，生态环境总的态势趋向不良方向发展。在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大力号召重建山川秀美大西北的今天，汉中盆地生态环境的变迁原因及教训皆十分值得引起重视。

一、汉中盆地森林的历史变迁

考古发现证明，远古时期汉水上游河谷两岸及浅山丘陵地区分布着茂密的森林。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勉县温泉、胡家渡、杨家山、赤土岭，南郑梁山龙岗寺及城固、洋县等地汉江台地上连续发现若干大熊猫、熊、东方剑齿象、犀、虎、羚羊

等森林动物化石^①。英钟据科学测定，这些古森林动物生活在距今二十万至一百万年之间，大致与关中蓝田猿人同期^②，可见这一地区森林存在已相当久远。全新世中期，汉中地区与四川盆地广泛分布着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针阔混交林^③，此外在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龙岗仰韶文化灰坑中也发现大量野生森林动物如野猪、野牛、林麝、华丽黑鹿、小鹿等骨骼^④。仰韶文化时代汉中盆地先民已有定居农业，但狩猎经济仍占相当比重，这些动物当猎自附近山林。综合汉中地区各处所发现的森林动物化石和当时人口聚落的地理环境，可以判断在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汉中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当在百分之七八十左右。西周以降，汉水上游的森林开始零星见于历史文献，《诗经》涉及汉中地区林木的诗篇计有《蓼木》《广汉》《殷其雷》《卷耳》《天保》《旱麓》《出车》《南山有台》《蓼莪》等二十余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中盆地生态环境的某些信息。如《诗经·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济济。”旱山，在今南郑县南湖附近，即今汉山。郑玄注说：“汉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云风润泽也。”《诗经》的《周南》《召南》篇中也有不少涉及森林的诗句，如“南有山木”、“南有乔木”等。“二南”所涉地域大致包括今湖北襄樊地区与陕西汉中地区，而以后者为主。朱熹《诗集传》注释说：“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王夫之

① 汤俊英等：《汉水上游旧石器的新发现》，《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② 黄慰文、郭国琴：《梁山旧石器遗址的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③ 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挖掘报告》第三章《遗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诗经稗疏》卷一也指出：《诗经》中的“南国”当指清代陕南，“陕西所统之南国为召南”。因此“二南”篇折射了西周至春秋时期汉中一带森林存在的某些信息。

春秋战国时期汉中盆地森林覆盖面积仍很广泛，土壤以腐殖质为主。《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其中梁州即包括今汉中地区全部兼带陇南、川北、鄂西北一带。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考证，《禹贡》大致成书于战国中期^①，这为战国区域地理的定位解决了年代背景问题。《禹贡》将梁州土壤定为“青黎”，自古经学家们颇感困惑，诠释者也是众说纷纭。当代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以其对土壤学的丰富学识判断“青黎”应是一种森林腐殖质土壤，他在与鲁桂珍女士合著的《中国古代的植物学》论文中精辟指出：“我们认为它（梁州）实际上是在汉水流域即位于今陕西与四川之间，所以‘青黎’这个词应该指汉水两岸山地腐殖质性暗色土壤，那里土壤中的复杂成分可从那些山岩的特性和天然植被的特点中得到解释。”^②李约瑟博士于抗日战争时期曾亲临汉中访问、讲学，有机会考察汉中山川河流土壤，他的这一解释应该是有一定权威性的。如此则梁州“青黎”土壤应该是战国时期开始的富含腐殖质的森林土壤，是战国时汉中盆地分布大面积森林的直接反映。结合《诗经》《山海经》《禹贡》等文献，春秋战国时期汉中地区林木种类有桑、杞、栲、柰、栎、棣、松、荆、楠、柞、槿等十多种。

秦汉时期汉水上游一带农业开发已有一定规模，但农田耕

^① 史念海：《论禹贡的成书年代》，《河山集》（二），（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② 《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地只限于谷地平川及秦蜀驿道附近，森林植被并未受到大的破坏。《史记·河渠书》记载秦岭南坡褒斜道“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汉书·地理志》也说楚地汉中内“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今盆地西缘勉县城西郊已一片荒山秃岭，但汉末三国时却树林茂密。建安二十年曹操率大军西征汉中张鲁，在沔阳平关（今勉县城西五公里）受阻，欲退兵，不料平关附近山上“夜有麋鹿数千”，冲乱张鲁弟张卫军营，曹操进攻，竟一举夺取汉中，收降张鲁。两晋南北朝汉中不仅有热带常绿阔叶林，而且多名贵材木，故左思《蜀都赋》说：“嘉鱼出于丙穴，良木攒于褒谷”。南北朝时汉中四周仍是森林环绕，《水经注》载：洋县黄金峡一带“山丰野牛野羊，腾岩越岭，驰走若飞，触突林木，十围皆倒”；沔阳定军山下也是“深松茂柏，攒蔚川阜”。说明此一时期汉中盆地边缘生态环境仍呈现出较多的原始特征。

唐代长江流域普遍兴起的“畚田”运动也涉及到汉水上游，汉中地区的山地农业开始兴起，但广大山区仍呈现出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景观。如兴州嘉陵江沿线“古松倒挂倚绝壁”^①；三泉县（今宁强）“稠树蔽山闻杜宇”^②。至于汉中盆地北部山区更是森林茂盛，褒斜道在唐代诗人笔下常常是“云树褒中路”^③、“绿树满褒斜”^④、“千里绿峨峨”^⑤。

宋代汉中平川阶地已全部开辟成农田，森林开始向浅山、丘陵退缩，但盆地南北巴山、秦岭森林覆盖仍然较好。北宋四

① 李白：《蜀道难》。

② 《全唐诗》卷四七〇。

③ 刘禹锡：《送令狐相公镇梁州》，《舆地纪胜》卷一八三。

④ 《全唐诗》卷五九五。

⑤ 《全唐诗》卷三一六。